

权力视角下英国在北尼日利亚 殖民地的本土语言政策*

孙晓萌

内容提要 北尼日利亚是英国对海外殖民地实施“间接统治”的发源地。殖民地本土语言政策的采用，既与“间接统治”思想一脉相承，也是豪萨语当时特殊地位与功用使然。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被赋予官方语言地位，通过确认拉丁化的文字书写方式、成立豪萨语规范化的权威语言机构、将本土知识精英毛拉塑造为“合法语言”豪萨语的“权威者”，以及举办豪萨语考试等方式，建立了殖民地“合法权威”与统治者的文化霸权。豪萨语本土语言政策的实施，对北尼日利亚殖民格局的重塑产生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 文化霸权 殖民权力 豪萨语 北尼日利亚

作者简介 孙晓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 100089）。

语言作为一种人际交流工具，除其初始功能以外，实际上，它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方面均有一定关联。后殖民批评理论先驱法依曾指出，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语言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①由此，当政者所采用的语言政策，亦与权力和权威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所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语言政策可以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力。^②本文选取的研究对

* 感谢《西亚非洲》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修改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Frantz Fanon,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Seuil, 1952, p. 21.

② [以色列]伯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9~50页。

象——北尼日利亚殖民地，不仅被视为英国在非洲实施间接统治的“优秀典范”^①，而且还是英国创建“间接统治”制度的最早发源地。英国运用颇具特色的非洲本土语言作为其统治媒介，构建了本土语言与殖民地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统治模式不仅被广泛推广到其他英属殖民地，还对英国以外的殖民地宗主国统治方式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尝试以权力为切入点，剖析殖民地语境下英国实施的非洲本土语言政策运行方式、特点和效果，通过建构殖民地合法权威和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阐释本土语言在殖民地权力建立、维护和巩固过程中的作用及殖民遗产的遗留问题。

英国在北尼日利亚实施本土语言政策的动因

北尼日利亚是指西非豪萨地区面积达 3.2 万平方公里的广泛地域。在前殖民地时期，北尼日利亚地区基本上由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所统治，一个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家^②，统治着北尼日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另一个是加涅姆-博尔努王国^③，控制着北尼日利亚东北一隅。^④ 1894 年，当卢加德统帅的英国“远征队”抵达北尼日利亚，并逐步侵占该地区、于 1900 年建立北尼日利亚保护地之后，正式开始通过“间接统治”方式实现对该地区的殖民管理。殖民政权建立的先决条件是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沟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语言沟通方式不仅是殖民统治的基础，也是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层面维持殖民政权的需要。事实上，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统治初期就做出了塑造“统治用途”地区通用语的政治决定。卢加德从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接手管理北尼日利亚时就意识到，当地士兵和民众等被统治者对英语一无所知，英国女王关于北尼日利亚保护地的声明当时是用豪萨语和努佩语（Nupe）宣读的。同时，对语言一窍不通根本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掘豪萨人

① C. L. Temple, *Native Races and Their Rulers: Sketches and Studies of Official Lif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in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68, p. 71.

② 索科托哈里发（Sokoto Caliphate）是 18 至 19 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强大的帝国，统治区域从如今的布基纳法索至喀麦隆。哈里发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及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③ 加涅姆-博尔努王国（Sultanate of Kanem-Bornu）位于乍得湖沿岸，在 9 至 14 世纪期间作为商业中心兴起，并于 9 世纪实现伊斯兰化。

④ 李智彪：《卢加德与北尼日利亚》，载《西亚非洲》1988 年第 1 期，第 45 页。

的潜力，卢加德将自己形容为“无望的、双手被束缚的人”。^①

豪萨语之所以能够从北尼日利亚两百多种民族语言中脱颖而出、成为殖民统治用语，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豪萨语业已具有不可撼动的地区通用语地位

自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建立到20世纪初期，北尼日利亚一直保存着伊斯兰学术遗产，在语言方面体现为“书写形式是阿拉伯语，有效日常沟通用语是豪萨语”情势。^②前殖民地时期，北尼日利亚地区已经发展为单一政治单元，半数以上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化同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富拉尼对豪萨地区的伊斯兰化、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被广泛使用。“豪萨语的使用范围北至阿加德兹（Agandes），甚至到达阿尔及利亚塔曼拉塞特（Tamanrasset），东至博尔努的卡努里和乍得的拉米堡（Fort Lamy），豪萨语广泛应用于尼日利亚西北部及更广阔地区，在廷巴克图也有许多使用者。约鲁巴人、伊格博人和尼日利亚南方人也逐渐通晓一些豪萨语。”^③柯克·格林（Kirk - Greene）认为，豪萨语不仅是北尼日利亚的地区通用语，还是西非2000万人的通用语。^④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地区使用范围被界定为本身是豪萨族的人群，通过各种同化过程成为豪萨人的人群，非豪萨人、但将豪萨语作为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语言使用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著政权系统运作中，书面用语采用阿拉伯语，而豪萨语则司职于有效沟通用语之职能。更重要的是，豪萨语是北尼日利亚地区和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整个西非商人、手工业者、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传教士之间都将豪萨语作为主要交际用语。

（二）豪萨语自身具备独特的语言属性

豪萨语属于亚非语系乍得语族^⑤，最初的使用者大约于公元1000年迁徙到富饶的萨瓦纳地区。公元10到15世纪，豪萨地区主要由7个分散城邦构成并演变出索科托方言、戈比尔方言、阿达拉方言、卡诺方言、卡齐纳方言和

① Margery Perham, *Lugard: The Years of Adventure, 1858 - 1898*, London: Collins, 1960, p. 118.

② Adekunle Adeniran, "Personalities and Polic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lish in Northern Nigeri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1900 - 1943",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ol. 9, No. 2, 1978, pp. 108 - 109.

③ R. C. Abraham, *Dictionary of the Hausa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5, p. iii.

④ A. H. M. Kirk - Greene, "The Hausa Language Board", *Africa und Übersee*, Band 47, 1964, p. 188.

⑤ 格林伯格将非洲的语言划分为四大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 - Sahara）、亚非语系（Afro - Asiatic）、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Niger - Kordofanian）和科伊桑语系（Khoisan）。See Joseph H. Greenberg, "The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0, 1948, pp. 24 - 30.

扎里亚方言等。商业的重要性使卡诺方言成为前殖民地时期苏丹贸易线路的地区通用语样本。豪萨语最初的传播仅限于比拉姆、道腊、腊诺、卡诺、扎里亚、卡齐纳和戈比尔“正统”豪萨 7 邦，在科比、努佩、约鲁巴、居昆等所谓“庶出”豪萨七邦的传播则显示出其具有的“地区通用语”特征。由此，豪萨语作为各城邦通用的唯一语言，也是相互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作为西非地区最重要的本土语言，豪萨语经过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书面语言方面已经具备阿贾米字体书写传统，并发展出以宗教训导诗歌为主的文学形式。在口头语言方面，豪萨语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包容性和同化性特征。宗教、政府、贸易和法律等方面词汇受阿拉伯语影响较深，在豪萨城镇中心发展并形成“经典”豪萨语，其中 30% 词汇是阿拉伯语的直接变体。除阿拉伯语外，它还受到卡努里语等相近非洲本土语言的影响。再则，豪萨语是一种“弹性”语言，可以演绎出“简单”的市井豪萨语^①与“复杂”的经典豪萨语两种类型。

（三）英殖民者对豪萨士兵的看重及满足其军事管理的需要

欧洲人在 19 世纪中期就将豪萨人定义为典型的“善战人种”，沉着冷静、遵守纪律、精力充沛，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仍能长途行军。卢加德形容豪萨人“一定程度上有些愚蠢，不易管理，但却是最好的战士。”^②因此，豪萨士兵在西非得到英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普遍青睐。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英国的西非士兵全部由豪萨人组成，豪萨语成为西非前线力量（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的通用语言。^③1901 年，卢加德在第一份殖民地报告中阐述了在西非前线力量中使用豪萨语的意图：“豪萨语和约鲁巴语如今处于同等重要位置，在各方面都有益处，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豪萨语在西非前线力量中的广泛使用。我认为保持军队中不同民族、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近期经验表明，异教徒英勇善战，讲豪萨语，我希望尽可能把西非前线力量变为一支‘讲豪萨语的异教徒部队’，同时相信它将成为最可信赖的军事力量。”^④显然，军队中士兵文化背景的多样化缓解了联合反叛的潜在

① 市井豪萨语也经常被等同于非洲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

② Margery Perham and Mary Bull eds. , *The Diaries of Lord Lugard*, p. 89.

③ David Killingray with Martin Plaut, *Fighting for Britain: African Soldi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Woodbridge, Suffolk; Rochester, N. Y: James Currey, 2012, p. 40.

④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Annual Reports for Northern Nigeria, 1901 - 1911*,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3, p. 23.

危险，使用标准的豪萨语军事短语确保训练中实现简明扼要的沟通。豪萨语在军队中因而成为多民族士兵群体间的“凝聚力”，提高了英国的军事统治效率。

（四）豪萨语的运用是殖民当局削弱殖民地原有社会文化根基的重要策略

前殖民地时期的北尼日利亚酋长国以伊斯兰教育为主，培养了大批宗教改革者，此后成长为统治者、法官和在社会中扮演各种重要角色的职员。1903年，英国占领尼日利亚之初，共有25万名学生在2500所古兰经学校学习。与此同时，毛拉和受教育阶层则供职于土著法庭和地方学校。卢加德坦言，“北尼日利亚保护地没有从900万人口中提供一名职员或手工业者”。^① 殖民地现存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及其在地区内产生的“伊斯兰”影响无益于殖民统治。基于此，英国殖民当局选择豪萨语作为殖民地统治语言，使用拉丁字符代替豪萨阿贾米，将阿拉伯语和其所代表的伊斯兰学术传统“边缘化”，从而削弱伊斯兰教在殖民地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阻碍其在英国间接统治体系下的宗教发展进程。

综上，豪萨语作为殖民地统治语言的采用，结合了北尼日利亚地区语言文化的发展情势。若从深层次探究其释因，则与“间接统治”制度学理密切相关。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即最高统治权是英国统治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对北尼日利亚土著政权、土著文化架构进行改进，形成有利于英殖民统治的方式，既可以行使帝国的权威，又可以满足英殖民当局维系统治的现实需要，还可以减少贯彻殖民政策的阻力。因此，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本土统治用语的采用，其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即源于此，亦是“间接统治”制度的表现方式之一。

北尼日利亚本土语言政策及其实践

北尼日利亚殖民地语言政策没有专门的文字描述，全部囊括在相关教育法案中，如《1882年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Ordinance of 1882）、《1921年至1924年菲尔普斯——斯托克委员会报告》（Phelps - Stokes Commission of

^① 参见英国殖民部档案：CO 879/119/8，*Report by Sir F. D. Lugard on the Amalgamati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Nigeria and Administration, 1912 - 1919*, Cmd. a 468. xxxvi. 609, p. 64.

1921 - 1924)、1925 年英国政府的英属热带非洲殖民地本土教育顾问委员会出版的、关于非洲学校教育语言的首个综合政策《当地教育中本土语言的地位》^① 以及殖民官员发放的数份备忘录中。这些文件提供了本土教育语言的宏观架构, 尽管没有直接提及北尼日利亚应使用豪萨语教学, 但在执行方面却依此进行。在推广殖民地语言政策方面, 殖民当局在非豪萨地区频繁使用豪萨统治术语, 所有北方“土著法庭”都倾向于使用豪萨术语替代其他本土语言。1930 年成立的北方酋长委员会是北尼日利亚第一个地方政治性机构, 多数演讲都使用豪萨语。此后, 随着北方议会和北方酋长会的成立, 豪萨语和英语在其中被赋予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殖民当局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 落实豪萨语官方语言的统治地位。

(一) 确定豪萨语书写方式的拉丁化

受伊斯兰文化影响, 豪萨语书写系统最早采用阿贾米字体。随着欧洲传教士的到来, 罗宾逊和殖民官员阿尔德·伯登 (Alder Burdon) 开始使用拉丁化豪萨文书写系统。在殖民地时期, 经历了豪萨语采用阿贾米字体还是拉丁字体书写形式的争论与并行。1909 年赫斯基思·贝尔 (Hesketh Bell) 任北尼日利亚总督后, 接受豪萨语拉丁化书写方式比阿贾米书写方式更易于掌握 (毛拉通常花费一个月左右可以掌握拉丁字符, 儿童大约需要两个月可以掌握。反之, 学习阿拉伯语字母通常耗费长达两年时间)、节省成本 (阿拉伯语字母印刷成本十分高昂, 尤其是豪萨语阿贾米中还需要添加额外元音标注)、实用 (相比较而言, 掌握阿拉伯语字母的政治官员寥寥无几) 等特点,^② 委托费舍尔拟定了豪萨语标准化拼写规则。次年, 费舍尔向殖民地总督提交了拉丁字符教学初级读本, 为豪萨语的拉丁化和标准化铺平了道路。1938 年, 《豪萨语词典》的问世, 标志着豪萨语拼写规则的最终确立。

《豪萨语词典》编撰和语言拼写规则的确立体现出殖民统治者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进行的知识形式转化, 从而将知识的本土形式转化为欧洲本体的一部分, 以“权威身份”指导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进行书写和阅读。尽管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没有出现征服者将英语强加于被征服者的现象, 但在语言本体规划过程中却表现出隐形的“语言帝国主义”特征。

^① 参见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879/122/2, in the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Place of the Vernacular in Native Education', by the Colonial Office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the Colonies.

^② Report by Hanns Vischer, Director Education (July 1, 1908) Northern Protectorate, March 2, 1910.

(二) 成立负责豪萨语规范化的权威语言机构

英殖民当局为了将殖民地本土语言书写“传统”演变为“系统”，从而进行永久性的文化合作和文化控制，^① 开始鼓励各种本土语言发展机构和实体的成立。1929年，殖民当局教育局成立了翻译局（1933年更名为文学局），将阿拉伯语、英语书籍译介为豪萨语，出版《豪萨戏剧六部》（*Wasan Kwaikwayo Guda Shida cikin Hausa*）书籍，创办第一份定期出版的豪萨文报纸《北尼日利亚报》（*Jaridar Nijeriya ta Arewa*），为学校提供教学用书等。1945年，成立了真理公司（*Gaskiya Corporation*），出版《真理报》。1953年，北方地区文学局（*Northern Region Literature Agency*）成立，出版各领域书籍、各州报纸、宣传歌曲、日历、卫生、交通法规等。1955年，豪萨语文局成立，出版了3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一是《豪萨语外来词字母排列索引》^②，包括巴杰里词典中未收录的250个新词条；二是《技术词汇汇编》^③，包括矿产、医疗和卫生、邮政和电信、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等11个“部门”的1000余个技术词汇；三是《豪萨语拼写》^④，改编自伊斯特的经典作品《豪萨语拼写和标点》（*Hausa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因为囊括了新纳入豪萨语的概念和表达法，司法词汇受到特别关注。上述相关本土语言文化机构的成立，出版种类多样的出版物，尤其是本土语言语法书、词典、课本等语言著述，以“权威身份”指导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和民众进行书写和阅读，起到了豪萨语维持殖民地社会秩序的工具作用。

(三) 将本土知识精英毛拉塑造为“合法语言”豪萨语的“权威者”

毛拉和阿布巴卡尔·伊芒是豪萨地区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在殖民地传教士学校中接受拉丁化豪萨文的“再教育”后，被立为本土语言运用的标杆。毛拉常常受到传统统治者酋长的尊敬，酋长本人甚至向他学习如何使用拉丁字符阅读豪萨语。此外，在真理公司内部，豪萨本土学者伊芒被置于与欧洲雇员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作品更被树立为“鲜活的、口语化而精致的豪萨语”典范。他作为豪萨语权威的语言风格、拼写和词汇使用标准成为豪萨语的典范，并被几代豪萨学者接纳和使用。但是，毛拉学习的拉丁化豪萨文、“伊芒

① Lindsay Barrett, “Gaskiya Corporation: A Living Piece of History”, in Husaini Hayatu ed., *50 Years of Truth: The Story of Gaskiya Corporation Zaria, 1939 – 1991*, Zaria: Gaskiya Corporation Limited, 1991, p. 79.

② Hausa Language Board, *Alphabetical List of Words Imported into Hausa*, Kaduna: the Baraka Press, 1958.

③ Hausa Language Board, *Glossaries of Technical Terms*, Kaduna: the Baraka Press, 1959.

④ North Regional Literature Agency Zaria Province, *Hausa Spelling*, Zaria: Gaskiya Corporation, 1958.

式”语言的真正缔造者都是欧洲人，因此权威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是完全被“建构”的。

（四）举办豪萨语考试

1902 年，卢加德在北尼日利亚年度报告中指出：“缺少诚实可信的本地翻译是这个国家的诅咒，从而使我们的管理变得艰难。唯一的补救办法是驻扎官学习豪萨语。”^① 同年，殖民政府发布了豪萨语语言考试官方通告。1904 年，殖民地已经发展到官员必须要通过本土语言考试，才符合政治部晋升的条件。^② 各个等级的豪萨语语言考试通常包括 6 部分内容：句子、听写、作文、英语 - 豪萨语翻译、豪萨语 - 英语翻译和口语考试。这些举措鼓舞了殖民地官员学习语言的积极性，为殖民地语言政策的贯彻铺平了道路。

殖民地语言政策巩固了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地位，通过殖民政权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其使用范围，赋予了豪萨文在学术、写作和交流领域的垄断权力。拉丁化豪萨文便于欧洲人掌握、印刷成本低廉、削弱了伊斯兰教在殖民地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瓦解”殖民地原有意识形态的重要宗教和文化根基。此外，因语言与权力的“同谋”关系，殖民地权力赋予豪萨语的合法性越大，合法语言树立的权威回报给殖民统治政权的合法性相应就越强。

豪萨语对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格局的影响

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是以语言为中介，固化权力等级结构，从而使宗主国有关“真理”、“秩序”、“现实”等概念在殖民地得以确立，并在权力主体和客体关系、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塑和语言文化秩序的建立等殖民地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建构了权力主体和客体间的制约关系与殖民地的“合法权威”

权力体现为一种关系，即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在资源占有上不对等的关系以及二者在能力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里的权力主体是殖民统治者，因殖民地利益的分化，使主体结构内部分化出伦敦殖民部、殖民地官员和欧

^①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op. cit.*, p. 105.

^② *Ibid.*, p. 215.

洲传教士三部分；权力客体是指被殖民者。豪萨语在殖民地的运用使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权力主体内部各结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呈现出多重“共谋”与“对立”的权力关系。

豪萨文拉丁化过程中的权力主体内部，即欧洲语言学家与殖民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同谋与对立关系。一方面，统治者迫使语言学家协助当局对本土语言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殖民统治工具并负载殖民地“软权力”构建的使命，得到当局认同的语言学家置身于殖民地架构的精英阶层，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象征性权力”的所有权。但另一方面，二者的关系有时呈现对立，在《豪萨语词典》编撰过程中，巴杰里在豪萨当地进行实地音译调查后，发明了繁琐的拼写方法，并坚持词典应既满足殖民地官员的需求，也应兼顾学者等其他使用者。他拟定的拼写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殖民当局的恐慌，被要求遵循简单和实用原则，放弃体现豪萨语方言多样性的准确性原则，非洲本土语言的原始风貌因此遭到破坏。

通过掌握非洲本土语言，驻扎在北尼日利亚的殖民地官员与本土传统统治者结为联盟，殖民地官员利用土著当局对抗传教士和伦敦殖民部。伦敦殖民部认为，英国殖民官员在北尼日利亚超越了其权限范围，形成了权力的“滥用”，进而制造了阻碍西方教育传入酋长国的最大障碍，殖民统治者利用酋长作为“前线”，成为“自身的法律依据”。

当然，在权力关系中，客体并非绝对消极被动，对于主体对其作用也有所反应，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主体。例如，豪萨语口语考试是殖民地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案例，豪萨人在考试中充当考官，殖民地官员为考生，原本的权力客体发挥支配作用，权力主体处于被支配地位。事实上，在这种特殊权力关系语境下，豪萨人作为权力主体期间行使权力所产生的能量和作用范围都极其有限，殖民统治者颠覆主体和客体关系只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英国殖民当局在统治过程中广泛使用豪萨语，成功建构了殖民地“软权力”并导致间接统治取得成功，主要依赖于统治者“合法权威”的建立。殖民地“合法权威”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语言，二是指殖民政权。英国殖民统治者以建立豪萨语语言的合法权威为手段，将语言作为“象征性”权力呈现，使殖民地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隐蔽和微妙的方式运作，为英国殖民政权冠冕堂皇地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进而获得通过其他权力形式无法建立的“合法权威”。

(二) 塑造了殖民地文化身份认同

关于身份,人们一般认为:“自我”是自主而稳定的,是独立于所有外部影响之外的。后结构主义等对身份观的颠覆性影响使人们认识到,身份不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的。前殖民地时期,豪萨语的阿贾米书写方式作为豪萨穆斯林身份认同演变过程中的本土化传统出现。自索科托哈里发建立伊始,学者就充当了社会中“智库”的角色,成长为无异于统治阶级的重要社会阶层。成为一名穆斯林,被视作是一种在殖民制度下获得有利地位同时又表现得同西方文化有一定距离的办法,同时也是成为世界性社会一部分的一条途径,这个社会得到欧洲人勉勉强强的尊重,同时却又提供一个可以表效忠诚的中心和一个表现独立自主的基础。^①豪萨穆斯林恰恰就属于这个范畴。

英国殖民当局选择豪萨语作为殖民地统治用语,并使用拉丁化书写豪萨文代替豪萨阿贾米,将阿拉伯语和其所代表的伊斯兰学术传统“边缘化”,从而削弱伊斯兰教在殖民地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瓦解”殖民地原有意识形态的重要宗教和文化根基。豪萨穆斯林的“文字所有权”遭到破坏,阿贾米的废止使伊斯兰学者和学生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语境中被视为“文盲”,从而无法在殖民地社会架构内发挥任何作用,唯有学习拉丁字符书写方式的豪萨语才可以再次被认可为“受教育者”,迫使豪萨穆斯林被动地在殖民地内部重新定义自身价值和政治角色。身份认同理应是一种身份选择,但是在殖民地文化语境中,豪萨穆斯林身份认同是被殖民者主观建构的,是被殖民者“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们因而被完全置于“阈限性空间”之中。

就殖民者而言,他们因为掌握豪萨语而成了殖民地社会的参与者,但在自己本身的自我认同定位上,会产生信心危机与一种疆界的不确定,同时又因为对当地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经常被一些谣传、种种无法理解的噪音和无法预料的社会政治局面所困惑、所动摇,因而产生身份认同的混淆和疑惑。^②殖民地权力结构由混淆的身份认同而产生一种矛盾状态,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被殖民者能动性,从而导致了殖民政权自身的

^① N. S. Booth, “Islam in Africa”, in N. S. Booth ed., *African Religions: a Symposium*,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1977, p. 320. 转引自 A.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1935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 424 页。

^② 生安锋著:《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03 页。

瓦解和崩溃。

（三）建立了殖民地语言和文化秩序

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巩固了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地位，通过殖民地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使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张。通过对豪萨语语言的本体规划，推动了语言标准化进程，产生了语法书、字典、语言翻译文本、本土语言文学作品等诸多语言著述，甚至使豪萨语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独立后发展成为尼日利亚“国语”的语言条件。殖民地本土语言政策客观上刺激了豪萨文的发展，使其演变为非洲具有重要地位的语言与文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中断了豪萨语作为非洲本土语言发展的原有轨迹，破坏了本土语言和知识的原始风貌。豪萨语作为北尼日利亚地区通用语被“制度化”后，导致了尼日利亚严重的政治分歧，它成为南、北尼日利亚分化、对立的象征性政治符号，对尼日利亚国家民族建造成不利影响。

殖民当局对殖民地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侵蚀，将“口语沟通”性质为主的豪萨语用严格拼写规则的拉丁化书写方式表达、将内容严格固化、带有强烈伊斯兰宗教动机的文学题材转变为真实与虚假混合的文学创作、将口头文学传统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①转变为阅读文本和图书发行，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方式向被殖民者进行意识形态输入，从而引发殖民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变革。

（四）殖民地社会阶层分化

殖民地权力的等级结构以语言为中介被固化，从而使宗主国有关“真理”、“秩序”、“现实”等概念在殖民地得以确立。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工具，豪萨语在殖民地制造了以毛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殖民地未来传统统治者的酋长子嗣阶层、殖民地雇员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对豪萨地区精英阶层的代表毛拉进行拉丁化豪萨文的“再教育”，成功瓦解了传统穆斯林教育的权威，并间接建立殖民地教育在地区内的合法性；酋长子嗣教育是培养其对宗主国热爱、诚实和效忠的品格，体现出当局在殖民地弱化伊斯兰教影响、瓦解其统治权力的意图，当局最终是要培养“理想统治者”取代富拉尼人。殖民地教育对传统统治者代表的本土统治阶级的偏爱，进一步提高并优化了

^① 北尼日利亚和整个西非地区都有“讲故事”传统，豪萨传说（Tatsuniya）尤其盛行，但只具备单一的娱乐功能，故事的内容亘古不变，“讲故事”的人不能随意更改内容，措辞稍有不同都会受到听众指责。

其在殖民地格局中的地位。

毛拉和酋长子嗣来自北尼日利亚不同地区，学习结束后返回所在地，反映出殖民当局希望削减殖民地范围内的分化，塑造“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认同，消除因民族和宗教因素引发的矛盾对立，便于有效推行殖民统治。豪萨语作为殖民地统治用语后，非穆斯林被强行纳入豪萨-富拉尼酋长国模式之中，并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阶层架构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在殖民地社会中未被赋予任何社会政治角色，“系统地”从属于豪萨-富拉尼统治。

殖民地小学阶段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教学，中学阶段和技术教育阶段才开始英语教学，多数非洲人的受教育程度仅为小学阶段，满足了殖民当局对于少数“新阶层”培养的目标。此外，前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土著社会中以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为了弱化传统统治者的权威，殖民当局为统治对象创造出土著政权权力无法触及的机会，从而使殖民地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更加注重“能力本身”。殖民者真实的目的是在非洲最终形成一个“即使不能讲英语，也可以阅读和书写拉丁化豪萨文的阶层”。

结 语

如前所述，殖民地语言政策巩固了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的地位，且通过殖民政权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其使用范围。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通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本土文学局等半官方机构作为知识的“产房”，制造本土出版物和报刊等知识“产品”，再通过殖民地教育体系对知识进行传播，通过采取“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方式获得殖民对象的自发同意和拥护。北尼日利亚殖民地的各种行为从社会关系上分析是一种权力结构，这种结构的解构与重构是同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话语权力所形成的真理机制把知识和权力连接在一起形成话语霸权。由于殖民地统治阶级具有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通过非洲本土语言来表达、并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社会大众中传播，将自身的价值观念信仰和意识形态普遍推行给殖民地各阶层，实现其“文化霸权”，达到“间接统治”之目的。

从历史走到现实，英殖民当局通过对豪萨语语言的本体规划，极大促进了语言标准化进程，产生了语法书、字典、语言翻译文本等诸多语言著述，甚至使豪萨语具备成为独立后尼日利亚“国语”的语言条件。与其他英属和法属非

洲殖民地相比，语言标准化进程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豪萨语通用语的强力推进，也压制了非洲本土认知的原始风貌，殖民当局的各种本土语言产品对非洲人的思维以及社会实践产生了制约性的“霸权主义”，本土语言因此束缚了非洲人的精神家园，扼杀了殖民地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彻底剥夺了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其他语言母语者的语言权。这恰恰反映了殖民主义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用的辩证关系，即“建设性作用”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

当下，基于历史发展的惯性，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豪萨语已成为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媒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豪萨语作为地区通用语、超越其所属族体而具有的“泛民族性”，从而推动尼日利亚国民文化同质一体化进程、培育相对统一的国民心态、促进统一价值体系和精神纽带的形成，将成为尼日利亚政府今后面临的重要挑战。

An Analysis on Native Language Policy during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Nigeria based on Power Element

Sun Xiaomeng

Abstract: Northern Nigeria is considered the origin place of British indirect rule implementing in its colonies. The applica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originated from the ideology of indirect rule, as well as the special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Hausa Language.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he colonizer construct “legal author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by different ways which include the Romanization of Hausa,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tative language bodies and institutions, making Mallam, the native Hausa intellectual, the authority of Hausa language and the Hausa language examin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has caused multiple influenc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Northern Nigeria colony.

Key Words: Cultural Hegemony; Colonial Power; Hausa Language; Northern Nigeria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